

满语在满族民间文学中的叙事表述

汪立珍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

满族口头文学凝聚了满族语言、历史、文化、宗教、文学、哲学等诸多学科的精髓，堪称满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作为传承满族口头文学语言，从 17 世纪中叶到现在，三百多年经历了由满语、满汉兼用到通用汉语的过程。这一客观事实，我们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整理出版的《满族民间故事选》（一、二集）、《满族三老人故事集》、《满族古神话》、《满族神话故事》、《满族萨满神歌译注》，及各区县搜集整理的《满族故事集》等数十种正式出版的民间文学文本中能够得到清晰的认识。可以说，上述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一些汉文转写的满语。这些珍贵的满族语言文化遗产在当今的口头文学文本中如何被使用，具有什么样的规律、特征，负载着什么样的民族文化价值，是我们今天审视满族口头文学遗产时不可忽视的问题。本文以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出版的口头文学文本为切入点，对满族口头文学文本中保留的满语进行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探讨。

一、民族历史记忆——满语人名

满族口头文学，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故事，凡是叙述到故事主人公的名称时，使用满语称谓的几率特别多。而这些满语称谓使用的具体语境有两种形式特别突出：

第一种是，直接使用主人公的满语称谓作为口头文学文本的题目。这种情况在满族口头文学文本中具有十分明显而突出的地位，而且在整体满族口头文学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满族口头文学文本里出现的实例来看，以

此种模式出现的篇目相当多，如，满族民间广为流传的神话《阿哈阿赫遇仙记》里的“阿哈阿赫”、《巴哈拉作画》里的“巴哈拉”、《松阿里和小青蛙》中的“松阿里”、《神医俄木列》中的“俄木列”、《布库里雍顺》中的“布库里雍顺”、《多罗甘珠》中的“多罗甘珠”、《姑布利开石门》中的“姑布利”、《勇敢的阿浑德》中的“阿浑德”、《恰咯拉的巴图鲁》中的“巴图鲁”、《赛音伊尔哈》中的“伊尔哈”等等，都是以满语称谓的人名作为口头文学文本的题目。这种实例在满族口头文学文本中比较常见，而且也相当典型，其数量之多，举不胜举。而这些口头文学文本题目中出现的满语人物称谓“阿哈阿赫、巴哈拉、松阿里、俄木列、多罗甘珠、布库里雍顺、阿浑德、伊尔哈、巴图鲁”等等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人物名称的外化显现，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名称的背后还体现满族人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以及他们的审美价值取向。

第二种是，故事的篇名虽然没有使用满语称谓的人物名称，但是在整个文本的叙事过程中，凡是出现故事主人公的时候，使用满语人名称谓。这种情况在满族口头文学中十分常见，尤其是在神话、传说和故事等叙事文学中更为多见。如，《荷花棒槌》里的主人公“哥哥俄木萨尔、弟弟都韦萨尔”；《三放人花》里的主人公“巴勒准、伊罕”；《枕头姑娘》里的主人公“德音太、付勒浑”；《金鱼姑娘》里的主人公“财主台桑阿、长工莫德杜里、阿吉尔哈”；《狐狸姑娘》里的主人公“巴羊阿”；《豆苍子花》里的女主人公“霍俊尔哈”；《放蚕姑娘》里的男主人公“乌迷雅”、女主人公“松吉尔哈、扎木尔哈”；《断臂姑娘》里女主人公“毕雅拉尔哈”、男主人公“巴彦图”；《三姑娘》里的人物“哈英厄”；《老将撵走丧门神》中的“巴图鲁”；《黄狗救主子》里的人物“突莫根”等等这些丰富的满族人名，足以让我们在口头文学文本中深感满族语言文化绵延下来的深厚底蕴。这些人物名称也为我们在 20 世纪的今天，领悟满语的历史价值与满族文化的真谛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满族口头文学文本中保留的满语人物名称基本上以上述两种形式出现和使用。满语虽然早已被汉语所同化，但是在口头文学这块厚重的精神文化土壤上，却仍然顽强地保留下一些传统的满语人物名称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不难看出，虽然这些满语人名以汉文转写的形式保留在民间口头叙述这一特殊形式上，但是它不仅仅是口头叙述的惯性，实际上镌刻着满族文化的内核和民族历史记忆。

二、民族文化认同——满语地名和社会组织名称

满族口头文学是一部活态的文化百科全书。我们不仅能够在口头文学当中，亲耳聆听和目睹满语人称、亲族称谓，而且还能够了解、认识与满族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满语地名、社会组织名称，以及其蕴涵的文化价值。

我国东北地区的长白山、黑龙江、松花江等地是满族聚居地。多少代满族先世在那里留下坚苦卓绝的开发足迹。而这些孕育、诞生满族子孙后代的摇篮之地，也自然成为满族口头文学传承者世代不忘、永恒传承的主题、歌咏的对象。这种绵延不尽的民族情感必然会影响讲述者的心态，讲述者每当叙述到长白山、黑龙江、松花江等沉浸在他们心灵世界深处的关键词语，传承者会发自内心地自然而然地使用满语称谓讲述。如，果勒敏山廷阿林（长白山），松阿里（松花江），虎尔哈河（牡丹江），忽尔汗海（镜泊湖）等等与满族起源历史紧密融为一体的地名，在满族口头文学文本中经常出现。这些满语称谓的地名在满族口头文学文本中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人们从中可以认知满族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社会历史文化关系。

满族历史永久，文化底蕴丰厚。历史上，满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而且还形成本民族独有社会制度。我们从这条深远绵长的满语链环可以挖掘到丰富多彩的满族传统社会制度文化。满族叙事文学文本中保留丰富的社会制度方面的传统称谓，如，穆昆（宗族）、穆昆达（族长）、佐领（地方武官）、牛录额真（八旗里的武官）、骄骑校（八旗里的小武官）、乌兰西（宫府），贝勒（首领），昂邦（大臣），笔特赫（掌管文书的地方官吏）等等，这些具有特殊内涵的社会组织与职位称谓，凝聚满族历史文化认同。而通过穆（宗族）、穆昆达（族长）、佐领（地方武官）、牛录额真（八旗里的武官）、骄骑校（八旗里的小武官）、乌兰西（宫府），贝勒（首领），昂邦（大臣），笔特赫（掌管文书的地方官吏）等这些词汇，探究满族历史上的氏族社会、八旗制度等独具一格的文化体系和特征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民族情感寄托——满语亲族称谓

除了人物名称、地名、社会组织等在满族口头文学文本中得到较好的保存以外，一些满族亲族称谓在满族口头文学文本当中也经常出现。这些传统的亲族称谓在满族口头文学文本中的保留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作为口头文本的篇名。不过，这种情况在数量上不能与人物名称作为篇名的口头文学文本相提并论，因为在满族口头文学文本中只有少量的篇目名称出现满语亲族称谓，而且只限于亲族称谓中的“格格”（姑娘）、“讷讷”（妈妈）、“阿玛”（爸爸）、“玛发”（爷爷）这些词汇。我们在满族口头文学文本

中见到的此类形式作品有：《织布格格》、《塔娜格格》、《朱舍里格格》、《柳树讷讷》、《玉石阿玛》等等，亲族称谓作为作品名称的形式构成有一个明显特征，即亲族称谓前面均附有修饰名词，如，织布 + 格格，塔娜 + 格格，柳树 + 讷讷，玉石 + 阿玛，其中亲族称谓前面的修饰词“柳树、玉石”等等是满族精神文化领域里具有举足轻重的概念。由此可见，以满族亲族称谓构成的作品题目是有一定的文化理念与特殊价值。

另一种是，讲述口头文学过程中涉及到亲族称谓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直接使用满语亲族称谓贯穿整个文本的始终。如，翁古玛法（曾祖爷爷）；阿玛（爸爸）、讷讷（妈妈）；阿木巴讷讷（老大娘）、萨格大玛发（老爷爷）；唉喂（丈夫）、萨尔干（妻子）；阿哥（哥哥）、额云（姐姐）；格格（姑娘、小姐）等等，这些称谓在满族历史生活中使用多年，并且有着深远的亲和力和影响力，至今在口头文学文本中仍然被保留，而这种保留与传承负载着满族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顽强守护。如，神话《白云格格》中保留了典型而传统的满语亲族称谓：

“兴安岭的山河沟岔，为啥盛产黄金？为啥人们都喜欢白桦树？从**翁古玛法**传到太爷爷，又从太爷爷传到爷爷、**阿玛**，代代传诵着古老的白云**格格**的故事……白云格格有**阿玛**赏赐的镇耳珠，可以平安地走到阿玛身旁……阿不凯恩都里睡醒后发现聚宝宫的钥匙丢了，大声说，这肯定是**伊兰格格**干的坏事……”。①《满族民间故事集》第二集，第4—8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

《白云格格》中出现的这些汉文转写的满语亲族称谓，“翁古玛法”（曾祖父）、“阿玛”（爸爸）、“格格”（姑娘）无形中为满族口头文学的传承注入了民族认同感和亲和力，而且也为满族口头文学增添了本民族独有的特质。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与亲族称谓相关的满族姓氏、部落名称在口头文学文本中也保留的较好，如，满族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大姓氏爱新觉罗氏、完颜氏、宁古塔氏、瓜尔佳氏、伊勒根部落、勃力哈达部落等在满族口头文学文本里出现的频率也相当多，而这些经常出现的氏族、部落名称也加深读者对满族先祖的认同。

满族口头文学文本中含义丰富、性格鲜明的人名、氏族名、部落名为满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奠定了基础，也有效传承满族传统的语言、历史、宗教等多元文化的根脉。

结语

以上,对满族口头文学文本中保留的满语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阐释。从总体来看,我们今天在满族口头文学文本中见到的各种满语名称、词汇、句子等等,都是用汉文转写的满文。对这些满语从语义、使用语境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人名、亲族称谓、地名、社会制度名称、萨满教歌词居多,而一些地方风格鲜明的日常生活用语次之。另外要说明的是,目前见到的满族口头文学文本,虽然为数较多的文本当中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满语词汇,但是这些满语词汇的使用频率也是各种各样、不尽相同。单从保留的数量和使用概率来看,大致呈现出两种情况:一是,以神话、传说、故事为主的散文体叙事文本内部中出现参差不齐的特殊状态,有的文本中只出现一两个满语词汇;有的文本中先后出现10个左右的满语词汇。二是,以萨满神歌为主的韵文体口头文学文本中保留的满语比较多,也比较完整。它不像散文体口头文学文本中仅保留个别词汇,有些萨满神歌通篇保存完地用汉文转写的满文歌词,也有个别神歌用满语记载,汉文对译。

以上分析是我们根据近年出版和调查到的满族口头文学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且通过逐一地整理归纳而总结出来的。由于本人涉及的材料有限,肯定还有一些疏漏。作为口头文学的载体——语言,也造就了传承人以及传承人代表的本民族的审美情趣,蕴涵着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本民族语言保护起到直接的参与作用。当然,除传承人以外,民族意识、生产方式以及社会体制等诸多方面也对满族口头文学文本保留满语有一定的影响。在此我们不加以赘述。总之,满族口头文学文本中保留的满语具有深远的研究价值和社会意义。本文只是浅显地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论述,不当之处希望同行指正。

参考文献

- [1] 张其卓、董明. 满族三老人故事集[P].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
- [2]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分会编.满族民间故事选[P] (一、二集).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1983年。
- [3] 辽宁省宽甸县民族事物委员会编.满族故事集[[P].辽宁省宽甸县内部资料。
- [4] 博大公、季永海、赵志钟、白立元.满族民歌集[P].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

15th Seoul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July 16-17, 2021

- [5] 爱新觉罗乌拉希春.满族古神话[C].呼和浩特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 [6] 宋和平.满族萨满神歌译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ABSTRACT

The narrative expression of Manchu language in Manchu folk literature

Wang Lizhe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This paper uses sociolinguistic methods to classify Manchu language retained in Manchu oral literature texts. It points out that Manchu names, place names, kinship relation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frequently used in Manchu oral literary texts, and expounds the cultural values and ways of inheritance contained in these Manchu languages. We analyze historical memory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of Manchu language in the express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in oral literature.